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理解全局：文献怎么说

摘要：社区伙伴关系并非新概念。众所周知，伙伴关系具有情境性，因此，没有两个伙伴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本章旨在探讨研究成果如何促进伙伴关系的成功。从“未来视角”来看，伙伴关系是实施教育课程的理想方式，而宏观趋势预测，未来教育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应对全球资源有限、社会关系日益重要的生活质量问题。具体到教师教育领域，文献表明，学校与大学之间成功的伙伴关系包含三个要素：连贯性和整合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经验以及新的关系。

秉持这些要素的成功合作关系会增加实现混合空间理想状态的机会。

为了促进家庭与体育教育领域的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发展，查阅研究文献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合作关系并非新概念，而是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没有两套合作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它们都与具体情境息息相关。柯克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继续改进，同时“重视积极的体育生活方式是一个重点……它也是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问题”。

© 编辑（如有）和作者 2016 T. Lynch，《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
DOI 10.1007/978-3-319-31667-3_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可能会使我们走向比今天更好的明天”（2014 年,第 106 页)。

展望未来

从“未来视角”来看,伙伴关系是实施教育课程的理想方式。澳大利亚国家课程以社会文化视角为基础（ACARA 2010）,并明确倡导“未来视角”。以健康预防为重点的健康管理需要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这一视角为教育部门和政府在学校实施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以及在社区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指导。未来视角会思考,目前就读小学的学生在13年后毕业时,他们的教育可能会是什么样子（Macdonald 2013）。大趋势预测,未来教育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以下挑战:世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世界经济从北向南、从西向东转移;相关的医疗保健成本以及生活方式和服务方面的应对措施;以及社会关系日益重要（Hajkowicz et al. 2012）。 “面向未来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 将为年轻人提供机会,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终身促进健康的行为],并成为终身批判性地消费健康相关信息的消费者,具备获取、评估和应用健康相关知识的技能”（Macdonald 2013,第 97 页）。

正如该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健康素养源于读写能力差以及读写能力差对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Nutbeam 2008）。
这与第二个千年发展目标直接相关: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2007 年）。
如前所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同,千年发展目标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课程改革还是采用了这一术语。

根据纳特比姆的观点，“健康素养”一词有两种概念化理解:优势和风险；“两者都依赖于读写和计算能力的基础,并且与具体情境和环境密切相关（Nutbeam 2008,第2076页）。”纳特比姆总结道：“阅读、口语交流和计算能力欠佳的人不仅接触传统健康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运用所接收信息的能力也较弱”（Nutbeam 2008,第2077页）。健康素养包含多个维度;这些维度指的是不同的方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读写技能的类型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功能性读写技能、互动性读写技能和批判性读写技能。

“功能性”读写能力是指具备在日常生活中有效运作所需的基本读写技能。在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中,这被解读为在健康教育中提出“问题是什么?”的问题(Macdonald 2012)。“互动性”读写能力是指“更高级的认知和读写技能,可用于积极参与日常活动,并将新信息应用于不断变化的环境”(Nutbeam 2008,第2075页)。在澳大利亚,这被解读为当人们找到资源来改善个人健康或学校社区时(Macdonald 2012)。第三个维度是“批判性”读写能力。这些是深度的、最先进的认知技能,可用于“批判性地分析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更好地掌控生活事件和情境”。

(Nutbeam 2008,第 2075 页)。这一维度与澳大利亚 HPE 课程中的倡导有关(Macdonald 2012)。

由于健康素养的各个维度经过调整和调整以适应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因此它们也可以在“最佳开端:社区协作促进终身健康与福祉”的健康与体育教育项目中得到体现。本文明确描述了已发现的问题(功能维度),并详细介绍了通过优势视角方法获得的资源和创建的资源(互动维度)。最后,本文还讨论了通过研究、申请资助和发表文章进行倡导(批判性维度)。

未来学校的家庭作业和体育课上,教师预计将扮演知识中介的角色,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伙伴并建立合作关系(Beare 2001; Ernst and Young 2012; Slaughter and Beare 2011; Macdonald 2013)。因此,未来的教师必须掌握如何做到这一点。知识、技能和理解的培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理解情境并建立信心,从而相应地调整课程,进而提升学习和教学效果,是教师应具备的能力。这通常需要走出“舒适区”,去体验和理解“情境”。同时,这也要求教师灵活且善解人意,而这正是教师教育者在当今(以及未来)世界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
> (Lynch 2014,第 1 页)。

大学与学校之间的伙伴关系转变始于美国,并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芬兰、澳大利亚和……等国最近都进行了改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DEECD 2012； Douglas 2014）。教师教育领域不仅在家庭作业和体育相关课程（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经历了这种转变，而且在所有教育学科中都经历了这种转变。

健康与体育教育相关领域的伙伴关系属于“优势导向”方法，该方法“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重点关注学习者，将其置于社区的结构性促进因素、资产和限制因素之中，并通过资源导向和能力提升的学习方法来实现”（Macdonald 2013，第 100 页）。

安东诺夫斯基的健康促进模型就是一个基于优势的方法的例子。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从健康促进的角度出发，将基于优势的方法付诸实践，具体包括：

- 更注重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而不是预防疾病；
- 将健康生活视为多维的，涵盖身体、社会、心理、精神、环境和社区等多个层面；
- 将健康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
- 将健康视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内涵；· 承认人类是积极的行动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环境；以及
- 健康本身并不被视为最终目标，而是被视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McCuaig 等人， 2013 年，第 113 页）。

从健康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优势视角，倡导建立伙伴关系和提升健康素养，所有这些都强调为人生和福祉做好准备，使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不同情境下迁移和调整。这些观点也支撑着“最佳开端：社区协作促进终身健康与福祉”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项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将人生准备原则调整为职前教师成功开启教学生涯的准备。

柯克建议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者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以应对当下并展望未来（ 2014）。下一节将探讨教师教育史，首先从传统的“理论应用模式”入手。以下文献摘自林奇（ 2015）并已进行修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师教育

“理论应用”是大学职前教师教育（ITE)的传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职前教师在大学向专家学习理论,然后进入学校进行实践（Korthagen 和 Kessels， 1999）。与之相反,也有文献指出,职前教师在实践中学习教学和学习的精髓（Ball 和 Cohen， 1999； Hammerness 等， 2005）,这涉及到在学校或与学校合作的直接工作。这类文献认为，在不显著影响职前教师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学和理论专家的作用（Grossman 和 Loeb， 2008）。此外,实习期间的指导教师对课程理论知之甚少,而大学的教师教育者对中小学课堂的实践也了解甚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Zeichner， 2010）。

因此,课程通常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独立的部分。
它们由一系列与教学和学习相关的单元/模块组成,但彼此之间缺乏关联,被认为对新教师的变革作用有限（Zeichner 和 Gore， 1990）。虽然有研究表明课程如何应对这种差距（Howey 和 Zimpher， 2006； Patterson 等人， 1999）,但高质量的实践研究及其对职前教师的影响仍然有限（Clift 和 Brady， 2005）。

在美国,理论模型的应用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教师教育从普通中小学转移到大学的时候。

教师教育往往“相当随意,依赖于随意选择的实习单位的特殊性,对实习期间发生的事情缺乏指导,与大学课程的联系也十分有限”（Darling-Hammond 2006,第9页）。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大学模式的碎片化是“系部之间的隔阂、个人主义规范以及一些将教师教育视为‘摇钱树’的院校聘用兼职教师”的结果（Darling-Hammond 2006,第7页）。目前已有许多尝试将校园课程与实地实践相结合,这些尝试涉及学校和大学之间的合作。

学校与大学合作

研究表明,大学课程通过协作克服了“理论应用”碎片化和差异化的障碍。 达林-哈蒙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06)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课程具有三个共同要素：

1. 一致性和整合性

连贯性和整合性挑战了传统的大学模式。“课程设置经过精心编排,基于一套完善的教学学习理论;课程之间相互交织,汇聚成一个清晰易懂的学习图景,并与指导过程和学生在学校的实践紧密结合（Darling-Hammond 2006,第7页）。”在这些卓有成效的课程中,单元/模块教师“指导和辅导师范生,有时甚至在实习学校教授学生和教师,通过角色整合将这些不同的课程要素联系起来”（Darling-Hammond 2006,第7页）。

2. 丰富的、有良好指导的临床实践经验,与课程学习相结合,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最有效的课程要求学生在整个课程期间投入大量时间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他们在课程中同时学习的概念和策略,并与能够向他们展示如何以对学习者有利的方式进行教学的教师一起进行实践。（Darling-Hammond 2006,第 8 页）。

参与实践性课程学习的职前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论、应用概念并支持学生的学习（Baumgartner et al. 2002; Denton 1982）。即使在现代,随着虚拟教室等技术的进步,真实的教学经验仍然无可替代。因为有观点认为，“任何课程学习本身都无法抵消塑造教师实际教学实践的强大经验教训”（Darling-Hammond 2006, p. 9）。

Darling-Hammond (2006)补充道：“尽管体验课堂教学并分析教学材料和实践很有帮助,但将理想付诸实践却是另一回事”（第9页）。这样的环境需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关系,中小学和大学教师/教师教育者之间相互尊重,并乐于贡献。有人认为,为了在这种学习环境中维持伙伴关系/关系，“需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领导者需要投入时间、理解、努力和个人特质,但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Lynch 2013,第 262 页)。

此外,科尔德雷(Coldrey)提倡教学的“灵活性”,他指出,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体育教育工作者“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调整课程”(2015,第17页)。因此,这对于职前教师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技能,需要在教师培训中加以练习。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机会在悉心指导下“创造创新课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第17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体育教育战略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前所述,该战略五大要素中的第三项就是课程灵活性(2015,第23页)。

3. 与学校建立新的关系

建立学校与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规划起来容易,实施起来难。有观点认为,这往往需要教师教育者和教师转变观念,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真心相信这是有价值且意义重大的(Zeichner 2010)。这可能会导致学校和大学/教师培训的内容发生变化(Darling-Hammond 2006)。

人际关系涉及独特的合作背景、挑战和矛盾(Martin et al. 2011)。此外,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转变可能会给相关教师带来威胁和压力(Sparkes 1991)。更重要的是,变革往往会导致冲突、损失和挣扎,而这些恰恰是成功变革的根本所在(Fullan 1982)。Darling -Hammond指出,“大学必须与学校更紧密地合作,共同推进变革议程,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各种挑战和混乱”(2006,第3页)。

伙伴关系中涉及的动态因素使得范式转变在实践中难以实现。“研究也表明,这些伙伴关系的实施有多么困难”(Darling-Hammond 2006,第11页)。正如课程改革因社会动态而复杂(Fullan 2001; Sparkes 1991)一样,在第三空间内发展新的实践也具有社会复杂性(Guitierrez 2008)。“规划和协调多层次的社会过程存在诸多困难”(Fullan 2001,第69页),因为这通常需要改变传统的做事方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三空间理论与混合空间

混合空间理论植根于第三空间理论。第三空间起源于混合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运用多种话语来理解世界（Bhabba 1990）。如前所述,传统的“理论应用”模式将学校视为实践场所,理论在此得到应用。这种视角被称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视角则将大学视为学生和教师学习发生的场所。第三空间涉及边界的跨越，“它摒弃了诸如实践者与学术知识、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对立,并以新的方式整合了通常被视为相互竞争的话语 一种非此即彼的融合”。

或者,视角转变为“两者兼顾”的观点”（Zeichner 2010,第 92 页）。职前教师可以通过“在教师教育中创造混合空间,使学术知识、实践知识和社区中存在的知识以新的、等级较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服务于教师学习”来更好地做好准备（Zeichner 2010,第 89 页）。

混合空间还具有培养职前教师与学校改进相关的同事技能的优势（Darling-Hammond 2006）。
研究表明,此类课程的毕业生“感觉自己知识更渊博,更有能力进行教学,并且被雇主、主管和研究人员评价为比其他新教师准备得更充分”（Darling-Hammond 2006,第 11 页）。

美国开始出现转变（Berry 等人， 2008； Martin 等人， 2011） ,临床经验和职前教学实践正在被重新思考和评估（Zeichner， 2010）。美国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 2010)专家蓝丝带小组关于临床准备和合作关系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芬兰、澳大利亚和英国近期的改革也印证了这一点（DEECD 2011； Douglas 2014）。然而,研究表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教师教育的复杂性以及“学习发生的场所”（Douglas 2014,第6页)常常被忽视。此外,它还需要“教师教育项目（课程)认识论的范式转变”（Zeichner 2010,第89页）。

因此,更深入的思考凸显了混合空间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文化、社会和认识论变革的空间,其中不同空间的竞争性话语知识被带入‘对话’ ,以挑战和重塑”（Moje 等人， 2004 年,第 43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思考这种复杂性时,Gorodetsky等人（ 2007)提到了边缘社群,将其视为促进平等合作和公平主义的第三空间,通过知识的协同作用来支持学生学习。文献中还提及了混合型教师教育者（Zeichner 2010； Martin等人2011）,即以大学为依托,与当地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以提升职前教师教育的教师教育者。一些大学已设立专门职位来承担这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通常与职前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相关（Boyle-Baise和McIntyre 2008）。对于许多教师教育者和/或潜在的混合型教育者而言,建立混合空间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社群内部建立联系,并探索合作的可能性。因此,有效的沟通和努力对于混合空间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Lynch 2012）。

具体到体育教育领域,Whipp等人（ 2011)收集的数据发现,中小学和大学都能从中受益。学校教师与外部资源（例如混合式教育者和大学生)合作,对体育活动的价值持有更积极的看法,这有助于教师建立自信。

舞蹈,而且压力较小。此外,有人认为,将健康、体育和运动作为学习领域优先考虑社区合作有三个关键原因:在社区内推广“健康素养”;倡导在运动中、通过运动以及关于运动的学习所带来的乐趣;以及健康、体育和运动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挥的示范作用（Lynch 2013）。

目前,关于示范课程的研究存在空白,缺乏对“混合空间”在实践中实际运作方式的阐释（Clift 和 Brady， 2005； Floden， 2005）。此外,越来越多的教师教育者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如何推进相关工作（Zeichner， 2010）。探索成功的合作关系模式,有助于教师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合作教育和可能的混合空间。在英国，“几乎所有英格兰的教师教育者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曾在中小学或继续教育领域工作”（Murray， 2010）,这意味着他们熟悉与学校和教师的紧密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创建混合空间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选择英国一门倡导合作的成功教师教育课程进行深入调查（第五章）。 ），其中可能包含混合空间的理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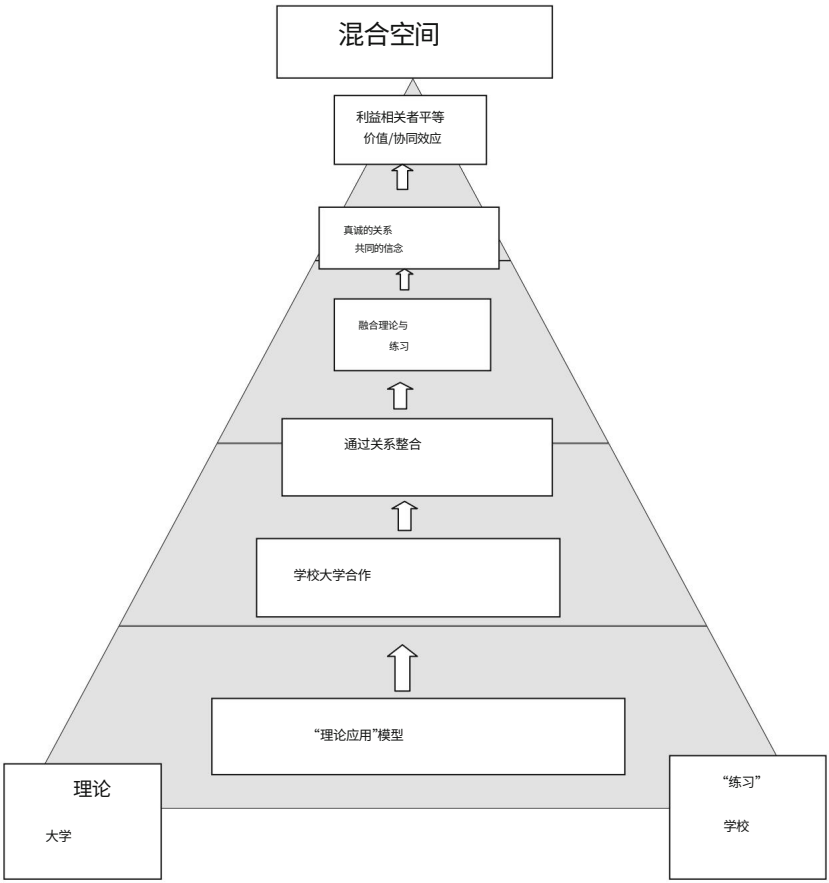


图 4.1理解高等教育与学校合作关系的概念框架

该特定课程被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评为“优秀”。

Ofsted是英国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我们直接向议会报告，并保持独立和公正。我们负责检查和监管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务的机构，以及为所有年龄段学习者提供教育和技能的机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每周,我们在英格兰各地进行数百次检查和监管访问,并将结果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http://www.ofsted.gov.uk/关于我们)

这些构成教师教育基础的主要主题塑造了教师教育的概念图4.1 以示意图的形式表示了整体框架。

参考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2010)。形状
澳大利亚课程版本 2.0。悉尼,新南威尔士州:ACARA。

Ball, D. 和 Cohen, D. (1999)。发展实践,培养实践者:迈向基于实践的专业教育理论。载于 L. Darling-Hammond 和 G. Sykes (编)， 《教学作为学习型职业》 （第 3-32 页）。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Baumgartner, F., Koerner, M., & Rust, F. (2002). 探索学生教学实习中的角色。教师教育季刊，29,35-58 。

Beare, H. (2001).创建未来学校。伦敦:Routledge Falmer。

Berry, B.、Montgomery, D.、Curtis, R.、Hernandez, M.、Wurtzel, J. 和 Snyder, J. （2008）。创建和维持城市教师驻校计划。北卡罗来纳州希尔斯伯勒:教学质量中心和Apen研究所。

Bhabba, H. (1990). 第三空间。载于 J. Rutherford (编),身份、社群、文化与差异(第 207–221 页)。伦敦:Lawrence and Wishart 出版社。

Boyle-Baise, M. 和 McIntyre, D. J. (2008)。什么样的经验?在公立学校或社区环境中培养教师。载于 M. Cochran-Smith、S. Feiman-Nemser 和 D. J. McIntyre (编)，《教师教育研究手册》 。

（第3版,第307-330页）。纽约:Routledge出版社。

Clift, R. 和 Brady, P. (2005)。方法课程和实地经验研究。
在 M. Cochran-Smith 和 K. Zeichner (编) 的《教师教育研究》一书中
（第 309-424 页）。纽约:Routledge 出版社。

科尔德雷,M.（2015年夏季）。在第二阶段关键阶段保持乐趣的核心地位。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要事》， 16-19。

Darling-Hammond, L. (2006). 构建 21 世纪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杂志,57,1-15 。

Denton, J. J. (1982). 早期实地经验对后续课程学习表现的影响。教师教育杂志， 33(2),19-23。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幼儿发展部。(2011年8月)。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讨论文件） 。检索自http://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about/programs/distanceed/tertedupgipps.pdf

教育和幼儿发展部。(2012)。学校领导和教师职业的新方向（讨论文件）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摘自https://www.eduweb.vic.gov.au/edulibrary/public/com-mrel/about/teachingprofession.pdf 。

道格拉斯,A.（2014）。实习教师在学校实习。汉普郡: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麦克米伦。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2)。未来大学。检索自http://www.
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University_of_the_future/$FILE/
未来大学_2012.pdf弗洛登,R.（2005）。艺术与科学课
程以及教育基础课程效果研究。载于M.科克伦-史密斯和K.泽希纳编。

（编）,教师教育研究（第 119-148 页）。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富兰,M.（1982）。教育变革的意义。纽约:教师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
富兰,M.（2001）。教育变革的新意义（第3版）。纽约，
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Gorodetsky, M.、Barak, J. 和 Hadari, H. (2007)。文化生态优势:合作实践社区的模式。载于 M. Zellermayer 和 E.
Munthe (编),《社区中的教师学习:国际视角》。

（第 99-112 页）。鹿特丹:Sense 出版社。
格罗斯曼,P.和勒布,S.（编）。（2008）。盘点:对替代方案的考察。
认证。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教育出版社。
Guitierrez, K. (2008). 在第三空间发展社会文化素养。阅读研究季刊,43,148-164 。

Hajkowicz, S., Cook, H., & Littleboy, A. (2012).我们的未来世界:将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全球大趋势。检索自
http://www.csiro.au/
en/Do-business/Services/CSIRO-Futures/Futures-reports/Our-Future- World

Hammerness, K., Darling-Hammond, L., & Bransford, J. (2005). 教师如何学习和发展。载于
L. Darling-Hammond & J. Bransford (编),为不断变化的世界培养教师(第 358–389 页)。旧
金山,加利福尼亚州:Jossey-Bass。
Howey, K. 和 Zimpher, N.（编）。(2006)。边界跨越者。华盛顿特区:
美国州立大学协会。
Kirk, D. (2014). 体育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探寻弗里茨·杜拉斯的遗产。《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5(2),103–116。doi: 10.1080/18377122.2014.906055 。

Korthagen, F., & Kessels, J. (1999).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改变教师教育的教学法。教育研究者， 28(3),4-17。

Lynch, T. (2012). 激流、暗流和障碍:调查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地区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的实现情况。

澳大利亚和国际农村教育杂志， 22(3),1-18。
Lynch, T. (2013). 学校教学卓越中心 (SCTE):了解学校和大学在健康和体育教育方面的新方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亚太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 4(3),249-266。
DOI:10.1080/18377122.2013.836770。
Lynch, T. (2014). 为澳大利亚农村、偏远地区培养优秀毕业生的资源包培训框架:全球视角。

澳大利亚和国际农村教育杂志， 24(2),1-14。doi： 10.13140/2.1.2518.7842 。

Lynch, T. (2015). 澳大利亚水上运动课程改革:小心翼翼地维持现状。
国际水生研究与教育杂志， 9(2),201–213。doi： 10.1123/ijare.2015-0005#_blank 。

Macdonald, D. (2012年8月28日)。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案
例?检索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of7HJubC7f4 Macdonald, D. (2013). 新的澳大利
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亚太健康、
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95-108。

Martin, S. D.、Snow, J. L. 和 Franklin Torrez, C. A. (2011)。探索第三空间:学校与大学合作关系中的紧张
关系。
教师教育杂志， 62(3),299-311。
McCuaig, L., Quennerstedt, M., & Macdonald, D. (2013). 以健康促进和优势为基础的方法作为指导
HPE 课程变革的理论。亚太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 4(2),109-125。

Moje, E.、Ciechanowski, K.、Kramer, K.、Ellis, L.、Carrillo, R. 和 Collazo, T.
（2004）。在内容领域读写能力中构建第三空间:对日常知识和话语资源的考察。《阅读研究季刊》，
39（1）,38-70。

Murray, J. (2010). 教师教育者专业学习中学术语言的新方向?教育专业发展， 36(1–2),197–209。

全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2010）。
通过临床实践改革教师教育:培养高效教师的国家战略。摘自http://www.ncate.org/LinkClick.asp

x?fi leticket=zzeiB1OoqPk%3D&tabid=7
Nutbeam, D. (2008). 健康素养概念的演变。社会科学与
医学,67,2072–2078 。
Patterson, R. S., Michelli, N. M., & Pacheco, A. (1999).教育中心。圣路易斯大学出版社。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Slaughter, R. 和 Beare, H. (2011)。重新审视 21 世纪的教育。
昆士兰州布里斯班:Foresight International。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
1-19 页)。
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Whipp, P., Hutton, H., Grove, R. J., & Jackson, B. (2011). 小学体育教育外包:评估外部提供的课程对全科教师的影响。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2(2),67-77。

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2007)。实现健康公平:从根本原因到公平结果。检索自http://www.who.int/social_determinants/resources/interim_statement/en/index.html Zeichner, K. (2010). 重新思考大学教师教育中校园课程与实地经验之间的联系。教师教育杂志， 61(1–2),89–99。

Zeichner, K. M. 和 Gore, J. (1990)。教师社会化。载于 W. R. Houston、M. Haberman、J. P. Sikula 和教师教育者协会 (编),《教师教育研究手册》 （第 329-348 页）。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